

政治教学参考资料

(二)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杭州大学政治系资料室

一九七九年二月

目 录

关于党史教学的若干问题

——在杭州大学召开的党史讲义讨论会上的发言

.....胡 华 (1)

关于党史教学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摘要)

——在杭州大学召开的党史讲义讨论会上的发言

.....胡 华 (28)

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吴克强 (56)

简讯..... (62)

本期由杭州大学政治系党史教研室编印

一九七九年二月

关于党史教学的若干问题

——在杭州大学召开的党史讲义
讨论会上的发言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胡 华

关于用实事求是、以实践检验真理 的科学态度进行党史教学的问题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报告中，强调了研究党史的重要性。华主席、叶副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号召全党干部来研究党史。邓副主席也多次指示，党史要赶快上，趁着现在老一辈人还在，有问题还可以找他们问，再过几年，要问也没有地方问了。可见党中央对党史是非常重视的。当前的问题，是在党史教学、党史研究中，贯彻实事求是，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问题。

第一个问题：教学和研究党史必须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以极左派出现的极端的反革命派。为了篡党夺权，他们就要篡改党史，为他们上台作舆论

准备。他们的手法，是打着“高举”旗号，把人民领袖毛主席故意捧到天上，歪曲成孤立的神。他们用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封建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天才”、“超天才”的天生圣哲；毛主席的理论的正确性，不是从实践中反复总结经验得出来的，而是毛主席脑中固有的，天生的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们用过头吹捧的手法把毛主席孤立起来之后，乘机把他们自己写进党史，编造一些神话，例如“林彪率部到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江青是文艺革命的旗手”之类，把他们自己描绘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主，用来愚弄人民，欺骗青年。要别人对他们只能顶礼膜拜，不能说半个“不”字。谁要对他们说半个“不”字，就要遭到他们封建法西斯“全面政专”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至投进监狱，杀人株连。另一方面，他们别有用心地把毛主席描写成唯一正确的、独来独往的个人英雄，一个人创造了一部党史、一个国家，把毛主席周围的战友描写成为犯错误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高举”一根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棍子，打击全党，好象毛主席的一生，就是他一个人同全党的这个干部、那个干部作斗争，这就是“党史”、“两条路线斗争史”。他们肆意抹黑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总理、朱德总司令、陈毅元帅、贺龙元帅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把李大钊、王若飞、彭湃、刘志丹、以至《红岩》里写的许多烈士如江姐、陈岗等等革命先烈，或是打成叛徒，或是横加诬陷。同时用“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谰言，来抹黑整个党，诬蔑党的干部，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他们妄图把整个党搞垮，取消。

在这一伙奸党大乱天下、暴虐横行的岁月里，真正是人人自危，充满了白色恐怖，冤狱遍于国中，凶犯加官晋爵，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受尽苦难。

这一段历史，是党史上、现代史上的一次历史大曲折。

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作为历史科学，它是遭受林彪、“四人帮”惨重糟蹋的重灾区中的重灾户。十多年来，只准他们讲假话，不准别人讲真话；只准他们歪曲党史，伪造党史，不准别人按事实说话。所以党史教学肩负着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是要拨乱反正，如实地编写党史、教学党史。特别是如实地阐明林彪、“四人帮”横行这一段历史的惨痛教训。正如敬爱的叶副主席所指出的：他们“篡改我们党的历史，他们已经做了许多歪曲的宣传，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这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进行党史、革命史教学，必须坚决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贯彻毛主席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学风和文风。用历史实践来检验真理，判断是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这种精神和学风来正本清源，进行教学和研究。

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方向，也就是什么是中共党史。

第一，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第二，中共党史是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党内“左”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特别是同林彪、“四人帮”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革命路线作斗争，并不断地将其克服的历史。

第三，中共党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不断相结合，经过胜利或失败的反复实践，而逐步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和逐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历史。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地发展的历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五十多年的党史证明，凡是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党就前进，革命事业就发展；凡是不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党就后退，革命事业就受挫折。

以上这三个方面应是我们党史教学的主要方向。

第三个问题：关于研究中共党史的目的和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教学中共党史。

第一，要学习和继承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烈、革命人民英勇奋战、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使我们当代和后代的青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沿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在新的长征中奋勇前进。

第二，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就是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接受历史的教训，使我们今后尽量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

我们要研究总结近六十年的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看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怎样做是正确的，怎样做是错误的，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使今后的工作增加自觉性，去掉盲目性。前车之覆，后

车之鉴。

比如说，关于“左”倾错误：我们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犯过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错误，他们不要广泛的统一战线，扩大打击面，主张“打倒一切”。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了一九四二年的整风，好容易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出现了一九四七年刘少奇在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而在一九六六年林彪、“四人帮”煽起的极左思潮，更是提出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口号，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针锋相对，严重地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

又比如关于右倾错误：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九三八年第二次王明路线又重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刘少奇搞和平幻想，一九四九年四月刘少奇天津讲话，又重犯右倾错误。

又比如，关于肃反扩大化和党内过火斗争问题：毛主席坚决反对了内战后期王明路线的肃反扩大化和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斗争。但是，一九四三年、四四年的所谓“抢救失足者”，又发生“审干”扩大化和过火斗争。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也有扩大化的问题。一九五九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来应当反左，却搞了反右倾。而到林彪、“四人帮”横行之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发展到了践踏宪法、撕毁党纪、任意逮捕、变相逮捕、抄家揪斗、私立公堂、非刑毒打，这样登峰造极的地步，发生了极端严重的所谓“清队”扩大化问题。造成了无数的冤案、错

案、假案。一直发展到“四人帮”血腥镇压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四五运动。而林彪、“四人帮”的血腥镇压人民的流毒和恶劣影响，至今尚未肃清，许多人还心有余悸，害怕历史的反复。为什么错误一再反复？有的错误甚至越来越严重？我们学习和研究党史，就是要总结这些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检验真理，认识谬误，使大家都知道，以便在今后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的长征中，真正能按正确路线前进，避免重犯历史犯过的错误。

第三，学习和研究党史，就是帮助我们完整准确地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避免和克服生搬硬套、照抄、照办的错误。

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一贯教导我们：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一贯教导我们：理论必须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当前的具体时间、地点、条件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实践是检验理论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马列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结合得好，就是做到了实事求是，革命就胜利、前进；结合得不好，也就是没有做到实事求是，革命就受挫折和失败。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样地走着曲折的道路。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实践正确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正确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群众的智慧、烈士的鲜血的结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

体创作，集体智慧。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中的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它不是死的教条，也不是宗教的教义。它教导我们的是怎样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教导我们怎样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学习党史就是告诉我们：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同志他们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应用到中国，富有实际精神，按实事求是原则办事，从而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学习中共党史，就是完整地准确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教科书。

党史上的瞿秋白线路，立三线路，尤其是王明线路，生搬硬套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还要走俄国革命的城市起义道路，危害了中国革命。

林彪、“四人帮”以极左面目出现，高唱什么“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一切按既定方针办”，打着“高举”的幌子，进行他们的丧心病狂的反革命阴谋。

但是，这种余毒至今并未消除，还是有人讲什么：“句句照办”，凡是过去高级领导讲过的，文件上圈过的，不论情况有无变化，事情有无差错，都不能动。谁要是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谁就是违反了所谓“中央精神”，就是所谓“砍旗”。这种思想是教条性的假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创造性的真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就是要通过对党史的研究来说明和宣传：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必须是完整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其思想体系。党的历史一

再证明，凡是摘引片言只字，照搬照抄，无不危害革命，引导革命走向失败。

第四，学习和研究党史，就是帮助我们认识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中国革命中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规律，我们党并不是一下子就摸清楚了，而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摸索过程，才逐渐了解和掌握了这些规律，从而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客观的经济规律，我们至今还是没有摸得很清楚。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政权的权力、长官的意志，并不是万能的。如果迷信长官的意志，迷信政权的职能，主观唯心地实行命令主义和冒险主义，就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抵抗，破坏生产和劳动者的积极性。陈伯达、张春桥大搞封建的“农业社会主义”、“平均共产主义”，大刮“共产风”，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一科学规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低、工农业遭到严重破坏的最根本原因。

因此，我们学习党史，必须重视现实问题，加强对现实问题和客观规律的研究。从近三十年的历史中，研究什么时候是胜利发展、欣欣向荣的，什么时候是困难、停滞以至倒退的？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总结规律，找出原因。尤其是近十多年的历史，一方面是林彪、“四人帮”猖狂地篡党夺权，把党和国家民族拖向濒于覆灭的深渊的历史；一方面，又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殊死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历史。以天安门事件为高潮，表现了九亿人民

的觉悟的空前提高，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这就是党史。

第四个问题：党史是一个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党史研究者必须有高度的党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

党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我们必须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还历史本来面目。不能歪曲、篡改党史。

同时，党史又是一门党性、战斗性、政策性很强的科学。什么问题可以讲，什么问题暂时不能讲，要有步骤，有一个过程；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也要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历史不能篡改，但有些问题暂时可以回避。有人说研究党史困难大，禁区多，风险大，因此，专业思想不巩固，社会上议论也多。但这也不光是党史课如此，祸根是林彪、“四人帮”。所以，我们要敢于拨乱反正。风险固然大，但它研究出成果来政治影响也大，教育作用也大。

因此，对党史工作者的党性要求也高，因为党史教员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这是光荣的称号，是艰巨的任务。党史研究者首先应该是革命者，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战斗。要增强党性的锻炼，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要真正做到用实事求是、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来教学党史。

第二部分 试谈党史教学中几个共同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党的领袖、干部、群众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党和人民的一位伟大领袖和导师，是党的

正确路线的杰出代表和胜利的旗帜；作为党的领袖和人民领袖，他是和他的战友们、干部们，和广大群众血肉相连的。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毛主席领导大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依靠亿万人民群众集体奋斗的结果。我们不能把毛主席从党的领袖集团中孤立出来，神化成为一个孤立的“天才领袖”，好象宗教的教主一样。

列宁每讲到无产阶级领袖时，总是强调是“一批人”，“一个集团”，而不是一个人。正如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所说：“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讲到领袖问题时这样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要我们学习“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并指出“在全党和全国发现了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5页）可见，毛主席也从来认为党应该有许多革命领袖，而不只是一个人。

林彪、“四人帮”打着“突出毛主席”旗号，打击党的其他领袖，孤立毛主席，是从根本上瓦解党和破坏党的领导。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也需要有一个通过革命实践认识真理的过程，毛主席从来主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发现认识错了，就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毛主席对马列、对自己从来认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反对本本主义》），马克思最反对别人对他过分的不适当的阿谀奉承，毛主席也反对林彪对他的过头的不适当的恭维，讨厌林彪虚伪地高喊什么“四个伟大”

“最、最、最”之类。他指出，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他反对林彪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我们研究问题要提到当时的历史范围内，还历史本来面目。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是奴隶们、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讲党史，要讲党的领导、党的一批领袖和干部，要讲群众。必须有血有肉，把阶级斗争、群众斗争、党的干部、党的一批领袖，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只讲一个人，或二、三个人。不能用传记来代替党史。不能象林彪、“四人帮”那样用英雄史观来叙述党史，看不见群众，看不见干部，甚至看不见党，用一个人代替全党。他们是别有用心，即“大树特树”，乘机树他们自己。叙述党史，要讲人物，讲思想、路线，也要讲丰富生动的历史事实；把历史事实和人物活动、人物的思想结合起来。

党史的教学内容也要结合历史发展，把毛主席著作当做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来讲。我们历来说，通过党史讲授来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最好方法。林彪、“四人帮”把毛主席著作割裂成一些条条，脱离了它发表的时间、地点、条件和针对什么情况而讲的精神和实质，抛弃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把毛主席著作歪曲成僵死的教条，说可以“立竿见影”，包医百病。他们“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用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假“高举”来掩盖他们的篡党

阴谋。同时也取消了通过党史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一最好的方法。

我们也不能把讲党史变成讲毛主席著作史，只讲某个时期发表了什么著作，有哪几条内容。这同样使理论脱离了活生生的历史实践，使理论失去了活的生命。

关于党史上的人物，毛主席的战友、党的干部、群众的领袖、各方面代表人物，在文化革命前，我们书上出的人物也并不很多。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人还年轻，还活着，还有变化，不便作历史的定评，所以提得不多，留有余地。现在，五四运动到现在转眼快六十年了，老一辈的人基本上可以作定评了，所以可以尽量多出现一些。使这一部党史更丰富更充实。《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正面人物出现了六十四名，群众领袖也出现了二十多名。我们的党史，出现人物应该更多。

周总理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看了延安纪念馆的陈列出现人物较少的情况后，曾提出批评。指出：当时的革命就是这样两、三个人干的吗？指示：要正确宣传毛主席的干部路线，要宣传毛主席周围有一批好同志，不要架空毛主席；宣传毛主席周围有一批好同志也是体现毛主席的伟大。

在我们这样伟大的党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人物应该出现。例如，创建党的一批人物；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中的人物；工农运动中的人物。又例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黄（安）麻（城）起义、渭华起义、横（峰）弋（阳）起义、海陆丰起义、平江起义、左右江起义以至宁都起义的许多人物；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及各个红色根据地的创始人物，红军的各个军、各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物，真是英

雄四路起干戈，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坚持革命斗争。白区斗争，三十年代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中也有许多英雄人物，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斗争。党外也有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一批坚持革命的著名人物，党史上也应有他们的位置。红军长征，江南三年游击战争，东北的抗日联军的斗争，是党史上三个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也应出现许多领导人物和英雄人物。许多老同志常常说，革命艰苦，再苦也苦不过陈老总，带着受伤的身体，坚持江南三年游击战争。还有东北抗日联军的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后，日军解剖他的遗体，发现他胃里吃的都是草。难道这样的英雄，我们不应该歌颂吗？

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三个师，新四军四个支队和后来七个师，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等各方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好的，都应出现。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四个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各个解放区的领导人物，也应出现。

党史，要把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的轰轰烈烈的群众场面加以展开和描述。不要只有干巴巴的几句话，把一部充满了历史事变和伟大斗争场面的历史，变成为枯燥无味的干瘪条条，使青年一代想象不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二个问题：关于党史教学中的若干人物问题。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对于历史人物应采取尊重历史，具体分析的态度。

第一点，关于陈独秀问题。

大家知道，在联共党史上，有一个普列汉诺夫。他在一

1981.6.1

八八三年到一九〇三年的二十年间，写了很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在八八三年创办了“劳动解放社”，后来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列宁对他在当时写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作了高度的评价，说“是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列宁全集》第16卷第267页）。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四年，普列汉诺夫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是动摇的，有时变成孟什维克和取消派。一九一七年他反对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变成取消派了。死于一九一八年。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功绩和错误，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而对他前期在理论上的功绩一直肯定和予以保护，并在他死后，建议把他的哲学著作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斯大林同志在主编《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时，也是充分肯定了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功绩，放在列宁革命活动的前面来叙述。

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一文里，谈到过陈独秀和李立三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至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1—892页）

毛主席对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和党建立时期的作用是肯定的。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同美国作家爱德加·斯诺谈话时说：

新民学会等“这些会社的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在《新

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模范。”（《西行漫记》118页）

又说：“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了上海。在那里我又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北大。或者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更大。……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组织“湖南改造联盟”的计划。以后我回到湖南就开始组织起来。”（同上书123页）

毛主席又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组织中间占主要势力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界领袖。我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我对于这方面的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是很有帮助的。在我第二次到上海来的时候，我和陈独秀讨论着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我生活中，这一个转变的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于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毛主席同斯诺谈自己成长的历史的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典范。毛主席谈话时，由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同志翻译，斯诺记录，然后吴亮平同志又把斯诺的记录翻译成中文，由毛主席订正，再翻译过去，所以是很准确的。我上面引了好几段毛主席的这个谈话，就是为了说明毛主席是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和党成立时期的作用的。周总理在党史报告中也讲过同样的意思。虽然，陈独秀也类似俄国的普列